

中国革命语境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体系的建构与发展

杨佳阔 王春雨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体系的建构

《新民主主义论》对中国民主革命一系列重要问题作出较为系统和完整的论述,它是一篇有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体系的经典著作,也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体系的初步建构提供了主要框架基础。首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运用马克思主义革命观作为话语体系建构了理论基础。其次,批判地继承三民主义,汲取三民主义的合理思想内核,革新完善其他问题,诞生了新民主主义。最后,结合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及独有的民族特色,以中国人独有的话语表达方式简单形象地演绎出晦涩难懂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真正地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春风化雨般地带入了人民大众的生活中去。毛泽东用丰厚的理论和巧妙的话语将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体系建构搭建起来。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体系的建构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创新、话语体系社会基础的夯实以及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拓展,都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 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思想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

首先,毛泽东立足于中国的基本国情,于1939年12月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①。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从周秦开始就是封建社会,它的政治和经济都是封建的,进而展现出的文化也具有一定的封建性。其次,从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主要矛盾入手,阐明中国革命在发展过程中对于性质、对象、任务和动力的多方面维度认知。最后,中国革命要经过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民主主义革命,第二阶段是社会主义革命。然而,现在所说的民主主义,则是新民主主义。毛泽东以“新民主主义革命”为核心,建构的革命话语体系充分回答并论述了“什么是中国革命”“怎样进行中国革命”“中国革命的前景是什么”等问题,体现了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和新的时代特征。

(二) 批判与继承三民主义,形成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体系

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体系是对三民主义批判地

继承。《新民主主义论》的问世,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及其话语体系的初步形成。但是,没有“旧三民主义”的影响,“新民主主义”是无法形成的。毛泽东按照演变的发展把“三民主义”划分为“旧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这两种类型的三民主义都具备其特殊性。所谓“旧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在1905年所提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方针。所谓“新三民主义”是孙中山1924年所提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其中清楚地加入了反帝、反封建的内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和“共产党人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的政治原则”使新三民主义的思想内核逐步升华。孙中山的民主思想的精髓部分即是三民主义,三民主义作为孙中山倡导的民主革命纲领具有一定的理论参考价值。这也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经常引用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重要原因。通过对孙中山关于三民主义论述内容的潜心研究,毛泽东抛弃了“旧三民主义”中对反帝国主义的奋斗纲领没有明确指出,对土地革命纲领的方针政策不够彻底,也没有体现出中国的近代发展的基本趋势。毛泽东运用批判和继承的态度来看待三民主义,并且通过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和新民主主义发展的需求,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话语体系中纳入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并使其具有全新的生命力与内涵。

(三) 融合传统文化与民族特色的话语风格

话语风格是语言系统的一种外部表现形式,一种具有生动活力和强烈感染力的话语风格可以充分提高话语体系的说服力和影响力。同时,话语风格更能直接影响传播效果。毛泽东在建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话语体系时,特别强调话语体系中的民族性和大众化问题。毛泽东深知,人民群众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性。对于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储备有限,对于他们来说,西方的话语表达方式和书本化的话语理论是晦涩难懂的,他们理解起来也存在一定的障碍。所以,毛泽东一方面通过吸收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使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体系更具有民族特色;另一方面通过融入大众喜闻乐见的民间文化,如修辞手法、成语、歇

后语、俗语、俚语等传统文化元素,使其更加通俗易懂,增添趣味性,把枯燥乏味的理论知识与富有生活气息的语言风格结合,真正意义上打破了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话语隔阂,也使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体系更加深入人心。

《新民主主义论》开篇论述中国该何去何从,毛泽东妙语连珠,巧妙地使用成语,如甚嚣尘上、粗枝大叶、欣欣向荣、愁眉锁眼、首当其冲等,生动形象地描述出了当时中国革命面临的困境与解决困境后的美好愿景。随后更是把中国独有的俗语“打入闷葫芦里了”“一番开台锣鼓”等运用其中,更让平民百姓了解到中国革命问题的严峻程度和中国革命面临的巨大困境。成语和俗语的表达方式有一定的局限性,毛泽东则另辟蹊径,借用民间文化中诸如“有敌大家打”“有事大家做”“有饭大家吃”等一系列被百姓熟知的老话,使其政治表述更具亲和力,不仅可以拉近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距离,更能使更多人民群众理解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政治平等的政治话语。除此之外,毛泽东还善于运用古代典故来论战,例如,西晋李密的《陈情表》中“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的典故,毛泽东把资本主义制度比作李密“九十有六”的祖母,失去了活力和生命力,仿佛枯枝烂木一样毫无生机。不但展现了毛泽东精彩绝伦的话语天赋,同时也强有力地反击了资产阶级的顽固分子关于共产主义的言辞之争。

毛泽东以中国人独有的话语表达方式,简明生动地描述和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使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得以真实存在。我们要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去对待外国文化,不能全盘西化,把值得中国学习的优秀文化进行吸收,并结合我国具体的情况进行创新性发展。毛泽东对于新民主主义话语形式的转化,不仅是文字与文化符号的转换,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精髓的话语建构。这种内容与形式相融合的话语建构更加凸显出中国的文化品格。

二、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体系的建构

延安时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的重要时期,文艺理论硕果累累。延安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不仅继承了俄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文艺党性、阶级性,还发展性地讨论一系列关于文艺理论的问题。聚焦中华民族革命的时代背景,结合文艺工作者的立场态度,文艺作品中的时代性与现代性不断涌现,文艺的传播力也随之提升。接受主体对艺术接受具有主导性,文艺接受主体审美趣味不断提升,使创作主体审美感知相应提升,从而提升文艺质量。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以人民为中心进行文艺创作,立足中国

革命实际,彰显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文艺品格,坚持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对立统一地看待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才能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批评范式,从而建构起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体系。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发展基石,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深化研究的理论指导。

(一) 以人民为创作中心,以马克思主义为创作指导

文艺的性质是文艺的根本问题,直接关乎文艺的指导方向和发展趋势。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²⁾这一论述深刻地表达出文艺的本质,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概念,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实质就是人民大众的立场。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核心范畴。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来源于马克思的人民观。纵观马克思的成长历程,他始终维护人民的利益。马克思在《莱茵报》任职时,曾以一支笔作为手中的武器,为了捍卫民众的权利,尖锐地批评过普鲁士政权的独裁专制。揭示资本主义本质和规律的著名书籍——《资本论》也是为了引导工人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思想火炬,被誉为“工人的圣经”。列宁则充分汲取马克思人民性的思想,指出:“艺术属于人民。它必须深深地扎根于广大劳动群众中间。”⁽³⁾延安时期,马克思和列宁有关“文艺的人民性”论述在文学领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极大程度地影响着文艺理论话语体系的建构。一批杰出的文艺工作者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以延安特定的历史语境为基础,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指导,提出文艺应为全体人民效力,而不是为“帝国主义”及“地主阶级”效力。进而使文艺创作与批评的人民性原则逐步确立,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延安时期的文艺创作实践中占据理论主导地位,也在文艺领域中获取更多的话语权,最终将“文艺的人民性”推向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核心方向。

(二) 立足中国革命实际,彰显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文艺品格

现实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理论,是从源远流长的西方现实主义理论发展变革而来的。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以“按照人本来的样子来描写”对文艺的现实主义进行了最初的界定。此后的西方现实主义理论基本就是沿着这一路径和传统发展过来的。按照“本来的样子”来描写,是重客观、重客体、重写实、重再现的表达。后因马克思、恩格斯对积极浪漫主义多有青睐,所以在传统现实主义的基础上,融合了美学精神、艺术特性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等要素,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的新境界。延安时期的艺术家们想要完成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现实

主义文艺创作,必须要在现实生活中保持敏锐的洞察力,艺术家还需要亲自参与其中进行体验和感受。只有亲身体验到生活中的现实,才能对描写的环境、人物及事件产生最真实的理解,进而艺术地反映生活,呈现生活本质。

在革命战争年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随着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入传播不断变迁。延安时期文艺理论,从根本上说是革命的现实主义文艺理论。一方面,在实践斗争中强调文艺反映抗战现实性,要求文艺家并不只是平铺直叙地描述现实,而是通过思考和分析提炼出现象的本质,以便于更好地使其发展。这些理论主张逐渐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科意识。另一方面,通过一大批优秀的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文艺理论的创新结合,与中华民族解放战争紧密相连,形成了独具中国革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更加丰富完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从文艺的角度去认识和反映现实,也是对现实进行改造的一种尝试。它不仅对延安文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具有极大的推进作用,进而建构起中国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文艺理论体系。

(三) 坚持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探究文艺与政治的合理关系

文艺是一种社会现象,我们要研究文艺的性质及其发展规律,最根本的是要从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及矛盾运动中去探求。文艺需要同政治、阶级和群众的利益及需求有机结合并且以有效的途径表现出来,才能真正实现文艺的价值。脱离了政治的这种作用,就是遗忘了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常识。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文艺服务政治的同时,实质上是通过政治为经济基础服务。文艺不能简单地成为政治的传声筒,应当反映大众的真实现状,文艺不能脱离政治,不然“文艺为人民服务”“文艺为一定阶级的根本利益服务”便成了空话。

所以我们在面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问题上,应当合理运用唯物辩证法对立统一原理分析,用全面的观点一分为二地看待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应在一定程度上联系政治,却不能完全被动地服从于政治。但立足于延安时期特殊的抗战背景下,在民族危亡的紧急时刻,要求我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文艺应当服从政治,但不能成为政治的附属品,而是要将文艺与政治有机融合在一起,在文艺批评中践行政治性和艺术性有机统一的批评标准,建构起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根本原则。用文艺的艺术魅力唤醒人民群众内心的觉醒和激情,为民族解放、人的解放提供一种审美意识形态,也为后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提供了现实启蒙。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体系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的现实启蒙

(一) 人民性: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核心范畴

延安时期,毛泽东对革命话语体系有了全方位的掌握,具体的发展体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的建构。毛泽东革命话语具有历史延续性,其建构逻辑、思想框架、理论支撑和概念范畴等方面的研究,都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体系乃至中国话语体系的建构起到重要的启示意义。

研究话语体系建构之前,必须明确该体系为哪个主体而建构,必须具有鲜明的政治立场和价值指向。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体系基于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有效地调动人民群众的参与性和积极性。人民群众积极响应这种以人民为中心,贴近人民大众生活的语言风格。这也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人民性提供了鲜明的理论指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的根本立场。”⁽⁴⁾ 习近平总书记这一论述,充分把党性与人民性紧密结合起来,从文艺的根本立场与党的根本宗旨与根本政治立场出发,体现出人民对于文学艺术及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发展的重要性及关键性。“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时代的创造者。”⁽⁵⁾ 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对象,通过历史与时代两个维度来强调人民的主体性,使“大历史观”和“大时代观”成了社会主义文艺建设的主旋律,开启中华民族文化觉醒的新篇章。通过对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体系的探索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更是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其一,生活即人民,人民即生活。只有深入人民群众的真实生活中去,才可以真正体验到人民的辛劳,感知人民的悲喜,才可以领悟到生活的本质,把握时代的进程,才可以创作出属于人民的文艺。其二,以人民为中心进行文艺创作,是要求文艺创作者以人民的角度和情感去考虑面对的问题,真正地把自己的真情实感与人民的现实思想融合,产生共鸣。此外,更要凸显人民情感的真实性和现实性,不能凭空虚构、捏造作者印象中的人民形象,不能讽刺劳动人民的形象,更不能用丑陋的笔触来形容人民大众。其三,要深入挖掘人民情怀,把人民丰富的精神生活与当代主流的审美意识充分结合,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淋漓尽致地体现在文艺作品中,把人民的满意程度作为检验文艺作品的最高标准。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体系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既具备问题导向、价值导向、实践导向和目标导向,更加指明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具体的发展道路,也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创作主体论谱写时代的新篇章。

(二) 民族性: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萌芽

民族性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内在属性。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民族性是毛泽东从民族性维度将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与民族国家命运相连, 建构起反对外来压迫, 主张民族独立, 为了中华民族的崛起而不懈努力的奋斗目标。文化的民族性是民族和国家发展前进的重要基石, 是唤起群众民族意识觉醒的根本动力。强调文化建设的民族性更是成为激发群众爱国情怀、唤醒民族危机意识、挽救民族危难的重要枢纽。

新民主主义文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结晶, 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的活力源泉。新民主主义文化既反映了革命的客观现实, 也反映了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积淀下来的宝贵精神和理想品格。因此, 民族性成为内在属性, 为革命的胜利及未来的发展提供了不竭的精神动力。毛泽东始终秉承着马克思主义思想, 吸收外来文化的积极部分, 用外来文化的优势来丰富发展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 既汲取外来文化创新的内容, 又保持中华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指出: “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 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 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⑥ “民族形式”论不仅仅只是为了解决文艺存在和产生的一些问题, 更是有意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 以中国革命的特点作为切入点, 探寻具有中国式表达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建构。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中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起到了关键启蒙作用。一方面, 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强调中国革命中的中国特色内容, 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为前提, 立足于中国实际国情, 把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历史经验同马克思主义理论相融合, 才能形成真正救中国于困境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另一方面, 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为了唤醒民众的意识觉醒, 更是在话语体系上运用了“中国化”的表达方式, 从民族语言、民族风格、民族叙事等方面更加生动传神地阐释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同时, 也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和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三) 创新性: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表达

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体系的构建为中国共产党赢得了重要的话语权。在革命宣传中, 中国共产党逐渐摒弃三民主义, 把新三民主义摆在主体位置, 形成了有关中国革命的全新话语模式。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同时, 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表达提供了创新的经验方法。

在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过程中, 毛泽东运用独特的民族性语言、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风格形式, 形成“中国化”的表达方式, 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路径上获得

更多群众的肯定, 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阐释提供理论基础。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 描绘马克思、恩格斯所谈的“自由王国”时, 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诗情画意的词语: “桃源”“大同”, 把带有中国式的意境“世外桃源”类比对理想社会的憧憬; 在谈及中国革命时, 运用“建房子”使其话语表达更通俗易懂, 一系列具有中国化的表达方式创新性地构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表达。不仅如此, 毛泽东也把这种话语风格带入更多的著作中, 如《实践论》中, 毛泽东用“知和行的关系”比喻实践问题; 《矛盾论》中, 毛泽东为了更好地阐释唯物辩证法, 运用“兵学圣经”——《孙子兵法》和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作为范例, 其话语风格和表达方式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建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中提出要用开放包容的发展眼光对待文化发展问题。新民主主义文化既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 又要在外来文化的不断涌入中汲取创新。注重文化发展的时代性和创新性, 只有不断创新吸收优秀的文化, 才能结合时代所需的文化特质, 把中国优秀的民族精神与传统文化相融合, 使中华民族新文化焕发出全新的生机, 才能创新发展新文化, 革除摒弃旧文化。

总体来看, 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体系创新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传统文化、客观国情、历史经验、社会问题等相结合, 使用传统的“中国化”话语表达, 更加生动形象地阐释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特点、道路、方法等, 也用中国独具特色的民族语言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解读, 使马克思主义更好地传播给人民群众, 从而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再发展也被人民群众更好地掌握和理解。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更是体现出了大国不凡的气度, 既保持中国民族性的传统文化, 又批判地吸收外来文化的精髓, 使中国的文化建设道路在秉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发展。

注释: -----

- (1)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3页。
- (2)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7页。
- (3) 列宁:《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35页。
- (4)(5) 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7页,第8页。
- (6)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页。

(作者单位: 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 吴景明)